

地说我们可以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我们能否确保种族歧视的民族主义的复兴对各不同种族、族群和民族身份群体的文明共存的可能性是一个真正威胁？

当前的局势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嘲弄，这就是在本世纪的下半叶，跨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已经促成了超越既有国界的移民网络和社区的多样化。移民和难民等这些概念类别不再能充分地表达全球迁移与定居的真实情况。意指跨越不同地方作无终止逗留（unending sojourn）的散居国外（diaspora）的概念，在许多方面比起移民和同化等这些语言更能反映跨国网络和社区的真实情况。多样的、循环的和返迁移行为，而非单一的从一个定居点向另一个定居点作长途旅行，这种迁移状况已经促使跨国空间产生转变。

对种族和族群研究的反思

Paul Giliory 将他具有挑衅性的一句话作为他文章的题目：“种族到止终结”，他表明我们要超越种族的分析类别，并对反种族隔离思想和政策这些词语进行反思。他与这本专集中的其他作者一道慎重地提出了警告，认为将种族和族群等概念具体化是十分危险的。这本论文专集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引发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在我们即将跨入新世纪时，也就是种族界限和其它族群差异与本世纪一样显著的新世纪时，如何对族群和种族的现现象重新进行概念化？在奉献本论文专集的同时，我们期盼未来有关这些问题与其它问题的前沿研究与学术成就的问世，以反映有关种族和族群观念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产生社会影响与政治影响，同时也期盼能为人们提供对话与争论的阵地。

（梁茂春 译）

【译文选载】

如家庭的一分子：种族、民族以及美国民族认同的矛盾¹

Patricia Hill Collins （帕特里夏 H. 柯林斯）

摘要：在许诺给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力和群体分类之间存在的张力目的是反对非洲裔美国人和类似的种族/少数民族群体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持续矛盾。这篇文章观察了这种矛盾，通过探求一个夸大的性别家庭怎样有助于理解种族和美国民族识别。运用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经验作为分析标准，文章建议非洲裔美国妇女被作为第二等公民看待反映了一个信念即他们就“如一个家庭”，就是，美国民族社会的合法一部分，但是同时是归属的一部分。为了调查这些联系，文章关注了 1) 相交社会的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式的看护助长是怎么样理解美国民族身份的。2) 美国典型的大的家族是如何民族化和规范化于组织社会的；3) 大的家族是如何助长作为一个大的民族家庭的美国民族身份的种族构成。

关键词：种族理论；性别理论；美国民族身份；非洲裔美国妇女；家庭观念；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别。

嗨，玛吉！我自己给自己早了一个忙碌的一天……那，我不得不取出我的水晶削球并带给司先生……一个相近的阅读……那，她是一个和气美丽的女子，当他们走的时候我将再也不会带给她如此多的麻烦，但是一一次又一次，她都用她的方式支配着我……今天，她和她的女性朋友

¹ 本文原刊载于英文《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杂志 2001 年第 24 卷第 1 册，第 3-28 页。



吃饭去了，我在清理完这些事情之后确实非常忙碌，她打电话给我要将我介绍给那个女子……哦，不，玛吉！我并不适应那一切。我拜见了那位女士，然后就回来继续工作。……然后这就开始了！我能够听见她在高声阔论……她在对她的朋友说，“我们很爱她！她就向我们家庭的一员，她尊敬我们的小卡洛！我们不知道没有她该怎么办！我们从来没有将她只当作佣人！”于是她还在不停的说……每一次我进去从桌子换碟子他们都会对着我微笑如同对这一只机器猫（Childress, 1986: 1-2）

在这篇节选自“如家庭的一分子”的文章里，一个虚构的六十二岁人的独白，由非洲裔美国女作家艾利斯·卡尔迪丝创作。非洲裔美国女工和 her 的好朋友玛吉，首次出现在保罗·罗宾逊的报纸《自由》上，标题为：“生活对话，马蒂尔德和玛吉之间的短小对话”，在巴尔的摩非洲裔美国人报纸上以“这就是马蒂尔德”为题连续出版。这份报纸的许多非洲裔美国读者本身就是这样的家务工人，马蒂尔德的大胆表白，代表了他们内心的声音（Harris, 1986）。这样一来，马蒂尔德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工人阶层的工人身份代表，而最初出版的虚构的事件发生地点在非洲裔美国人的产品中也是稀有和大胆的一个——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写给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工人阶层读者，运用被美国人所控制的媒体。上面选自“如家庭的一分子”的提出了两个重要主题，关注种族、少数民族和美国民族本身矛盾的内在联系。

首先是一个种族/少数民族群体如何能够显著地控制包围他们的社会不平等的不同感觉（Collins, 1980a: 44-76）。这种特别的小品文提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和公民身份具有两种意义的观点，一种由更多的正在日渐降低其重要性的权力群体而促进，另一种由具有相对较少权力的群体所提出，他们的有限地促进其争论。司女士和马蒂尔德的浅显对话就如同司女士所希望的一样。将马蒂尔德束缚为一个尽管被爱然而却是二等家庭阶层的框架内的成员，使得司女士能够忽视两个妇女之间的权力联系。更甚，司女士对看似自然的她的家庭权力结构的信任使得它能够控制内在的权力。

这种“如”的资格在这里是很残酷的，因为它显示了司女士定义什么是家庭和马蒂尔德在她的关于一个正常家庭的规定里所处的位置。尽管马蒂尔德知道她在家庭里的位置，只是作为一个附属工人，她也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理解美国族群身份，当公民身份就决定了她所归属的群体时，就会与相似的主题产生共鸣。司女士对代马蒂尔德的视角，即她是“如”一个家庭的一分子的错误广泛存在于白种美国人，而非洲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波多黎各人还有其他历史上的被压迫的种族/少数族群在美国社会里被同样地对待，打上鲜明的附属工人阶层烙印，这样的群体能够忍受，只要他们一直处于被界定的位置。这不是一个政治结果，但是一个控制结果。美国的非白人就“如”我们一样，他们连结着我们，但是他们不是我们，这种观点如是说。在这篇文章里，如同司女士的赘言和马蒂尔德的被迫沉默所揭示的一样，白种美国人很少去听非洲裔美国人所表达的看似分享了美国人的经历的、没有经过审查的观点。司女士在这一章里的话也反映了第二个重要主题，考虑到在种族、少数族群和美国族群身份之间存在的联系，很明显，家庭的代示在整个过程里夸大了规范化和自然化（Collins, 1998b）。与男女平等分析不同的是，批评白人男性的种族压迫仍然保持激烈的沉默，关系到白人妇女的过失，在卡尔迪丝的文章里已经反映了种族权力是如何在妇女中运转的。

通过这种运动，它暗示了男人和女人在构成了种族不平等，促进美国公民身份进入一个重要的性别分析。在这个重要的逻辑推论里，因为家庭经常可以看作独立事件，包括家庭和妇女都与此有联系，他们被认为离开了公共区域活动及制定种族、少数民族、公民地位。尽管将妇女仅仅作为一个性别事件的群体来看待，驱逐她们仅仅作为家庭的独立区域而存在，积极有效的促使性



别与种族、民族、美国公民身份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分离开来。通过描述种族阶层在一个家庭体系内构成和自然化，卡尔迪丝的小品文解决不了这个公开的或是独立的合成体。相反，卡尔迪丝的主题鼓励我们去观察这个二重的家庭功能。比如，家庭作为一个观察工具运转，构成和加强权力联系。司女士的观点是马蒂尔德就如同家庭的一分子，构成和加强种族和阶层的权力变迁过程，以此构成他们每天的内在活动。在同样的时候，家庭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社会组织的原则。司女士和马蒂尔德是是不同的生物和种族家庭的成员。在美国社会里，当家庭和种族世系长久以来被用来分离社会权力和职能，出生于一个仍然保持极端重要的白人或者黑人家庭。运用这种经历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比如马蒂尔德在这篇文章里，就如一个标准，我探求着作为“如家庭的一分子”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是如何构成，比如，美国民族国家的合法部分，但是在它内部存在的二等公民身份，助于我们理解在种族、少数民族和美国民族识别间存在的联系。马蒂尔德的尴尬处境加强了美国民族身份的内在矛盾——显然的，如何将个体权利承诺给她，通过美国法律保持的并列于现实的她所得到的因其种族、性别和阶层身份而获得的不同群体对待。马蒂尔德的地位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些联系怎么样被看作规范的和自然的联系，就如同家庭的特征被夸大和试图去联结这些规范化和自然化的过程。

考察这些联系反映了美国社会看起来特殊的特色，显然的，变化的奇特联系和构成了美国社会位置的特点。美国社会是如何有这样的广泛社会重组，从她在 1600 年代一个安排的社会起源，仍然保持了由深层的种族不平等所决定的特征。当然，美国政治经济的许多变化都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去剥脱种族不平等，其定义了美国民族国家的特征。为什么种族仍然在起作用？

变化和继续：种族、少数民族和美国民族识别

哲学家伊特尼·巴里巴定义外部和内部的民族优越感为两种相联系的现象，出现在想法的社会中。外部的民族优越感通常发生在当权势群体试图排挤弱势群体处学校、工作、邻居、居民、民族国家或者是社会空间，这样更多的权利群体能够察觉到术语中的财产和天生特权。当取消或是废除种族优越感的时候，外部的种族优越感会产生一种观点和行动

排除外来者或者‘其他人’进入此空间。为了保持邻居、学校、同事和民族国家的种族同质性这样的种族优越感是为了纯化地理上的或者是社会空间上的冲击，这样较低的种族看起来就被描述了。通过行动表现的比如仇视外国人、种族灭绝或者是叫做少数民族清理，外部的民族优越感目的是排挤那些不受欢迎的种族出看起来属于强势群体的空间。相反，内部的民族优越感发生在当强势种族群体归属于弱一点的群体，在一个的社会里，典型的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群体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内在的种族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行动，很明显的削弱弱一点的群体以此来使更多的强势群体获益。镇压和剥削的民族优越感、内在的民族优越感发生的观点和行动这样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种族群体，通过种族群体身份保持社会特权阶级。经由行动所表达的比如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内在的民族优越感包括和控制在被权力控制的空间里那些弱一点的种族群体。当分析的区别，既不是从它本身典型的发生而来，因为他们保持了深刻的互卷，外部的和内在的种族优越感经常

加强一个在预先存在的民族国家的边界里。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在 1930 年代的德国和澳大利亚影响了纳粹民族国家政策说明了外部民族优越感是怎样分离犹太人人口目的是为了剥削和控制而演变成一个外部民族优越感带来的种族灭绝。种族优越感的各种形式都是附加于一个民族种族的议事日程，带着悲剧性的结果。同样的，反抗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权力，

比如大不列颠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分要依赖于非洲、南美和



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战利品。就如同他们和亚洲的帝王之间的联系。当欧洲民族国家的边界跨越反殖民斗争，而看起来是纯粹形态的时候，后者所获得的外部的民族优越感，包括从欧洲本体空间来的外国人，还有被征服的土地的居民。更为近期的是，然而，当来自非洲、亚洲和加勒比的移民到达这些民族国家而且其人数日益增长时，内在的民族优越感的技巧开始变得重要。当这些双重的民族优越感对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变得完整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民族识别本身能够通过这样深入地嵌入种族过程而变得复杂，它变得很难去勾画除了种族以外的民族识别过程。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如同美国民族识别一样，悲哀地说，反映了这些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外部的和内在的民族优越感。在形成一个以白人为主权的殖民国家的过程中，欧洲美国殖民者看见了他们追寻的土地和资源，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新的民族或人民的权利。

在美国的殖民过程中，白人，无论是有资产的白人还是白人的契约仆人，开始限定面向和提起非白人位置设置为固有居民和被奴役的美国人。在白人殖民者、土著居民和被奴役的美国人之间，这种核心的种族三角形关系变得对于新的美利坚民族国家来说很基础。土著居民遭遇外在的民族优越感，被作为外国‘闯入者’或者是他们自己家乡的‘部落’而对待。最初在殖民世纪和起先的民族国家建立的100年间，在战争中被杀的和被征服的土著人口变成‘印第安人’或者是本土的面向太多的被打破的态度和致力于他们的公开政策的研究。与此相反，殖民时期，被奴役的美国人遭遇内在的种族优越感，在市场上被改变和修饰，而他们被剥削的手工劳动在南方农业就和非洲裔美国妇女的产出劳动一样。内在的民族优越感的变化过程需要一点时间——从奴隶制开始，到吉姆·卡洛，到在居住教育和雇用方面被深层进行种族分类——但是对于黑人劳动剥削的需要依然持续。朝向土著居民的外部民族优越感反映了白人居民需要排除本地居民出白人居民的家园空间在那里内在的民族优越感指导非洲裔美国人在非洲劳动依靠于一个新的民族做出鲜明的。更甚，在欧洲居民、土著居民和非洲移民的后代之间的联系不仅形成了同样的构成了美国公民身份的种类——上层白人阶级，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外国印第安人，以及次等的黑人公民——在这三个群体之间存在的联系日益复杂，成为美国国家身份识别的基础的本质成分。完成这种种族民族身份识别需要减少无数的少数民族，使得欧洲、美国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口成为三个核心种族部门。英语、法语和挪威成为白人美国人，他们的权利逐渐允许擦去假定的白人和正统血缘‘美国人’作为可见的身份部门。尽管白人本身被抹去，在白人中存在的可见的美国身份的阶级差别。柴罗基族、摩希根族和纳瓦合族变成了本地居民，他们从政治主体中出去，以类似的殖民者或者‘保护者’而集中居住。除开‘本土居民’的意料，本土美国人更经常得将外国人看作好的外来美国人。优鲁巴人和阿散蒂人成为黑人，他们，通过迁移到城市、改变一定形式的城市殖民相似的保存乡村的本土美国人。一直归属在民族国家，非洲人民后代带着无意识的次等公民身份的瑕疵。本土和黑人作为阶级的代表，都带有这一种族的烙印。

大致上，创造了白人、本土居民和黑人的基本的种族联系，铭记于美国法律和顾客需要崩溃大量的少数民族，在每一个种族部门都试图创造一定的属于自身的种族部落。白人、土著和黑人都构建包括互相联系和预先存在的少数民族的要素。如公民权利所标示的，种族部门的构架方式在属于他们民族国家自身方面是不同的，即对于不同阶层的白种美国人一个对于本土居民来说含糊的和竞争的公民地位，对于非洲血统的人来说是长久的次等公民身份。在这三个种族群体之间存在的联系不仅构成美国民族认同的完整的开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法典，而且种族联系再三的被修改为回复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紧急事件。历史的说，因为白人、土著和黑人之间的种族九个成为美国民族认同的核心，它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彻底的转变。相反，种族意义的多边性使得它能够转变形式，但本质不变。对于本土的和迁移的少数民族群体，已经是或者将成为‘美国人’需要操纵一个位置，在白人、本土和黑人之间的种族指向的联系。只要有种族纠葛所带来的民族罗盘保



持原型，即外部民族优越感的消除限定了白人/土著人民的联系，而奴隶制的内在民族歧视，吉姆·卡罗种族隔离，时髦地从法律的民族隔离角度来看，他们也描述了白人/黑人的联系，这样美国民族认同才有了它自身的意义。其余的一切都会变化，但是种族纠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美国民族认同的关联。记住种族纠葛描述了一个为了给美国民族认同下定义而设置模板是很重要的。目前的人口群体从来没有非常适合这些种类。例如，拉丁美洲人口构成在这三种‘种族’混合类型里的变化很大，这样，从它的开始就有了在这里描述过的种族纠葛的变化。而且，纠葛构成了盟约反对那些个体和群体计量种族认同。讽刺地，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定义它自身为不属于这些种类，尽管也会试图保留种族特权阶层因为这些种类本身就是必需的。这种种族纠葛的固执部分的解释了，美国社会如何经历自身的基本社会制度和民族人口的重足以此来回复资本发展的各个阶段，尽管，出于某种原因重复一个看起来长久不变的种族隔离。白人处于建立在农业资本基础上的美国民族国家的顶层：他们保留至今。本土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都处于底层，这些群体也保留至今。在美国社会从农业资本向全球资本转变依靠于服务工业，除开美国社会大量的地位重组，种族纠葛的基本轮廓依然存在。白人、土著和黑人的定义，人口的大小、外观和文化态度包括每一个种类；目前的术语被用来描述这些种类，随时间而变化。少数民族自尊心由此而生，尽管种族类型本身的需要依然存在。这个种族/民族合理的给美国理解美国民族认同框了一个框架。美国经常民族联合的一个重要范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民族形式，被定以为民主的形式，保护个人权利，法律上的信念调和那些特殊利益群体。平等对所有美国公民因为，不管种族、民族起源、从前的奴隶地位和肤色，所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依靠这些原则，美国力图在不同民族群体之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且在公民之间培育跨民族的合作。

但是当论述涉及到这儿所提出的种族、民族和美国民族认同时，美国社会的实际工作仍然更接近于和民族国家主义相关联的思想，而不是通常被认识到的。在民族国家主义的假设中，一个“国家”由在血缘基础上属于同一民族的一群人组成。在美国，白人基于种族纯洁性的血缘关系组成白人自己的“国家”。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关于他们是其中一个“人”的文化表现形式——他们的音乐、艺术、语言和风俗——组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民族认同。此外，白人赞成英语是唯一语言的社会制度，并且在惯例上惩罚那些使用非标准美国英语的人和那些社会制度与被假定的白人文化不一致的人。在这种民族国家主义的模型中，理想地，每一个民族群体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群体自治的政治实体。关于民族的这种理解在欧洲文化中具有很长的历史（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2; Yuval-Davis 1997, pp26-9），但是很少被应用于解决美国民族认同的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民族或者部落成员授予公民权利的民族-国家通常被看作是处于前现代化或者“倒退”，但是当它来到美国的时候，国内的国家主义似乎抹煞了美国民族认同的显著的民族基础。美国民族认同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把与个人权利相联系的民主自由和分属不同群体的白人、土著、非裔的待遇现状并列起来，因此反映了公民理想和民族国家主义之间复杂的张力。

移民群体长期面临在这个种族三角形中解决一个美国种族/民族认同的挑战，这对美国民族认同而言是必须的。大量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时期，加勒比海国家移民进入美国的时期，以及二十世纪早期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国内的一次重要的国内移民，阐明了一个美国民族认同重新被解决的重要时期。在到达美国之后，爱尔兰、意大利或者犹太民族这些欧洲民族在他们原来的民族—国家中会和其他民族分开，被重新定义为民族移民，通常是非白种外国人。这些新的爱尔兰美国人、意大利美国人和犹太美国人拥有生物上的特性得以获得白人认同，但是缺乏种族三角关系的经验历史。这些群体的成员通过同化进新的美国认同从二等公民变为一等公民。但是什么样的美国认同表现出最大的许诺？是否欧洲民族的移民把他们的命运和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非裔美国



人和土著美国人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否他们根据白色皮肤的特权要求意等美国公民的身份？

正如 Noel Ignatiev (1995) 在《爱尔兰人如何成为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一书中提醒我们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还远没有清楚。对于那些在欧洲被当作从属“种族”的群体而言，在美国的环境中把他们自身重新界定为一个特权“种族”不会毫无争议地被实现。人类学家 Karen Sacks (1994) 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质疑，“犹太人是如何成为白人的？”尽管白人民族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同化，但是强调和抹煞白色显然对于支付附着在一等白人公民身上的利益而言是一个小代价。

被迫观赏这个欧洲同化过程的非裔美国人常常发现这是一副难以吞咽的苦药。在与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e 合著的《质问种族》(A Rap On Race) 一书中，非裔美国作家 James Baldwin 描述了美国人的定义中种族的重要性：

星期三我看见一群人走下船板，让我们假设一下，不会说一句英语。到星期五发现，我正在为他们工作，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叫我黑鬼。然而残酷的是，意大利人的企业或者甚至犹太人的企业，通过一样东西和我的企业相区别……。不仅仅因为我是黑人，而且因为我是黑鬼中的一员。美国人可以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对待我，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他们永远不能用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一个非洲人 (Baldwin and Mead 1971, pp. 67-8)。

在这篇文章中，Baldwin 指出了同化、白人和一等公民之间的联系，以及种族歧视中内在的种族主义如何发挥作用使得非裔美国人作为二等公民处于从属地位。

二十世纪早期的非裔加勒比海移民迅速地发现他们面临着与欧洲移民们既类似又不同的挑战。他们很渴望一等美国公民的利益，但是却发现当他们“在星期三走下船板时”，他们在星期五的经历和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企业”是不一样的。通过突出加勒比海民族认同而使他们和美国黑人保持距离构成了一种策略减轻了那种给予非裔美国“黑鬼”的作为二等公民的痛苦，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一等公民的待遇。认识到这些矛盾之后，大量的非裔加勒比海移民加入了 Garvey Movement。选择抛弃他们与非洲美国人和后来非洲美国种族的复兴的命运，“加维驳船运动”的成员和其它类似的政治组织认识到只要沉默的“白人”采用“美国人”这个词，他们就仍然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他们的经历说明作为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提供给新移民的同化的神话对那些可识别的具有非洲特征的移民具有不同的含义。

利用多种族构筑种族化美国认同的似乎永久性的过程(但是不是任何一个时期种族化的公民类别将会采取的方式) 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种族化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当然肯定还有其它的与种族模型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在这个方面，性别起了很大作用，是如何作用的呢？

美国家庭理想：正常化和天然化种族秩序

美国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对美国家庭理想如何促成妇女的压迫的分析 (Andersen, 1991)。这个理想包括几个组成部分。作为异性吸引基础上的自然和生物学设置，理想的家庭包括结婚的、异性的配偶，她们生产他们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一个良性运转的家庭保护和平衡所有家庭成员的利益：母亲和父亲照顾孩子；成年人照顾他们年老的父母；丈夫照顾妻子。每个人根据他或她能力的大小为家庭成员作出贡献并取得相应利益。尽管这似乎是家庭成员利益的一致，但等级秩序在家庭中不仅存在，而且被认为是自然的、正常的及为家庭生存所需要的。正常的家庭具有一个天然的权威结构，也就是说，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赚取足够的家庭薪水；一个在家的主妇；及孩子。那些把家庭形式理想化为公共世界之外一个私人藏身之所的人把家庭看作一个由基本的爱和关心的感情纽带通过这种天然的权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劳动力性别分工中，妇女的角色基本上被定位在家庭而男人则在公共的工作场合，美国家庭



理想也假定工作和家庭的分离。

正如女权学者所指出的 (Andersen, 1991; Thorne, 1992), 这个理想促成了性别不平等。特别是, 男性家庭主导的观念同时优待和天然化男性权威作为整个美国社会的基本前提。就像男性在私人家庭空间的领导一样, 男性也是公共空间的社会设置的领导。而且, 男女应有适当空间思想的影响也促进了性别化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理解。因为妇女总是跟家庭联系在一起, 家庭空间变成私人的。女性空间与公共空间截然不同, 男性空间则跨出了它的边界之外。

家庭空间只是属于成员的: 外面人只能被家庭成员邀请进来否则他们就是入侵者。在这些性别化的公共和私人空间领域, 女性和男性又承担了明显不同的角色。女性被期待留守在她们的家庭空间里。避免公共街道的危险空间使女性可以照顾小孩、病人、老人还有其它家庭依赖成员。男性被期待支持和保卫他们家庭中私人的、女性的空间。总体上来看, 美国家庭理想所发展的天然性别秩序观念——在经济自主和进入公共空间的自由方面区别对待儿子和女儿——和支付性劳动力市场中性别类职业和男性控制着政府、职业运动、街区和其它公共空间的实践交织在一起。

美国家庭理想对性别秩序的重要性说明这个理想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在其它社会秩序中发生作用。比如, 通过其集权作为管理财产的机制, 家庭在正常化社会阶级秩序时又一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设置 (Collins, 1998b, 2000b)。美国的继承法一直被用以财富的代际转移, 不只是通过个人到个人, 而是通过家庭线索。出生时, 个人继承他们家庭积累的财富和/或债务, 家庭反过来又构建了确定孩子的社会和真实资本。这种实际财产从父母到孩子的代际转移以及那些有财产的人产生的利益说明家庭在控制贫富, 尤其是从一代到下一代, 的不平等集中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设置 (Oliver and Shapiro, 1995)。

家庭理论因此使美国家庭中分配财富的社会实践天然化和正常化。这种财富和债务的代际转移构成了社会阶级秩序再造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劳动力市场部门中分配个人的劳动力实践反过来导致对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工作要求规则中市场化差异的收入, 而这种规则把这个过程描绘成基本上是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实践需要一个习惯性的建立在美国家庭理想意义基础上的美国合法化权威结构。例如, 在美国家庭理想的逻辑中, 年龄和长幼就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惯常形式, 在这个秩序中, 成人对孩子有天生的权威, 年长的子女自然的要为年幼的负责。那些辈份越大的人集中的责任和利益也越多。诸如此类的思想对于创造一个平等的、正常的权威秩序来说似乎是良好和公平的观念。然而, 当对应到劳动力实践时, 看来自然的思想在制造经济机会和不利时变得重要。“最后雇佣, 最先解雇”规定明显歧视工人的信念忽略了过去歧视妇女和种族群体的排他主义做法。类似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通过家庭遗传机制的财富的代际转移, 仍然扎根于类似的信念, 即在早先时代取得财富的奴隶主, 自耕农和其它人在积累财产时, 具有一个合法的引领作用。

通过这种方式, 社会阶级和性别的社会秩序依赖于与美国家庭理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同时, 这些秩序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于家庭。另一方面, 阶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似乎是用来使家庭彼此分离的排他主义实践。排他性的实践要求家庭纯洁观念。从外部种族主义的回忆来看, 目标在于把社会侵犯群体, 这里指的是贫穷和工人阶级家庭, 从大学入学、良好邻居关系和教授职位这些被看作更富有中等和高等收入美国家庭财产的竞争中排除出去。相比之下, 性别秩序更多地依赖于用来使长久处于个人家庭单位的成员服从的实践。对于被配偶殴打的妇女和被父母虐待的孩子来说, 支配变成与爱交织的东西。从思夫人对米尔菊的想法——‘我们就是爱她’——看来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孩子以及慈善的雇主对他们的黑奴的天生的权威掩盖了所涉及的权力。回顾与国内种族主义相关的实践, 在维持同一体系中个体的权力差别变得重要的地方, 性别秩序与邻近差别的主旋律一起发生作用。虽然阶级和性别显然是一起起作用的, 家庭中支配和剥削的实践可以比压迫更不易察觉, 同时更难于反抗, 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它们是在家庭和所有家庭



都应如此的背景下习得的。

举个例子，小卡罗逐渐理解了阶级优越、性别从属和种族主义，就像在艾丽思·查尔爵斯小品文中描述的那样。卡罗通过她的两个母亲，思夫人和米尔菊的交往了解了两种形式的秩序。尽管思夫人明言米尔菊像这个家庭的一员——‘她真是喜爱我们的小卡罗！’——卡罗清楚地知道她白种的母亲要比黑种的母亲优越。作为培训中的思夫人的缩影，卡罗正在学习对一个种族的阶级秩序中白种妇女位置的性别化理解。同样的，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富有的白种美国男孩和女孩居住在全是白人的地区，参加的是全是白人的学校，在白人的足球队开展运动。当像小卡罗这样的孩子真的碰到种族群体成员时，这些人一般地处于从属位置，或者更近地，是具有类似社会阶级背景的挑选出来的朋友。这些孩子学习以指定性别的方式在财产家庭所买得的安全领地里学习种族化社会阶级秩序的意义。这个意义上的秩序变得正常化，因为它与似乎天然的家庭财产、邻居、学校、教堂、娱乐场所和地区商品市场的家庭过程相联系。

利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实践类似于那些外部和内部的种族主义，与美国家庭理想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化和正常化种族秩序。家庭意识形态在构建种族思想时尤为重要。例如：自然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关注的是“血缘纽带”假设如何构建了血缘、家庭、血亲和种族中可见的联系。在美国，家庭和血亲观念从血统流动中获得力量，这种血缘流动作为支配权利展开的物质（Williams,1995）。家庭是经由维持再生产的血缘线而延续血缘联系的机制。尽管合法体系深深蕴含于异性性取向的对偶的法定婚姻中，但是赋予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祖母和子孙的似乎天然的联系的重要性标识着血缘在构造生物学及天然化家庭、种族定义的重要性。要看待血缘联系作为家庭基础的深度，我们只有回顾同男、女同性恋婚姻的根深蒂固的反对。因为这种结合被看作非生产性的。他们打破了异性性关系和婚姻所理想化的血缘关系的明显天然性。代表着相关个体的基因联系，血缘纽带的信念天然化了血缘网络成员的联系。

由于生物学上的重要性，不同种族群体的妇女在维持这些似乎天然的血缘纽带中具有不同的责任（Collins,1999）。比如，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在保持家庭和种族血缘纯洁中担任着特殊的角色。在今天的新技术之前，维持富有的白人家庭需要控制白人妇女的性关系，主要是通过倡导婚前纯洁的社会准则。通过与白种男性的婚姻和她们丈夫的异性性关系，富有的白种妇女保证了白人家庭的种族纯洁。因而，通过防止对所有白人妇女婚前性行为和种族交互的婚姻，纯正的白种人家庭可以避免种族下降为混血（Young,1995）。当重新进入天然化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秩序和通过种族隔离空间及国家认可的暴力等机制而制度化实施时，管理性关系及婚姻的努力重新加强了“血缘纽带”的圣洁性。

历史地来看，通过对种族的生物学强调，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定义正常化了通过法律、习俗及种族化社会设置的基层结构来强化的血缘纽带的重要性。生物学的家庭及种族的家庭都依赖于类似的观念（Goldberg, 1993）。种族作为美国家庭的定义传统上建立在科学所证明及法律所授可的生物学分类基础之上。通过体形上的相似观念，如肤色、面部特征或发质把人们分类，并且得到法律和习俗的支持，白人利用科学的种族主义把自己、本土人和黑人定义为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Gould,1981）。正如由血缘纽带联系的“真正”家庭成员被期待为彼此相似一样，产生于同一血缘支线的种族全体成员也被看作具有相似的身体、智力及道德特征。根据这种逻辑，那些缺乏生物学相似性的人被看作家庭之外的人，而不同种族群体也变得彼此互不相识。

除了这种美国家庭理想所发展的理论之外，与真实美国家庭相关的实践也天然化和正常化了种族秩序。家庭的多重含义——作为家庭财产的家以及作为居住地的家——也说明了家庭在管理对种族秩序如此核心的财产关系时的重要性。在这种美国家庭理想的逻辑之下，理想的家庭是居住在一块随着时间财产价值会得到体现的良好地区的单一家庭。家庭的家本身就是家庭的投资。



然而，当结合了那些把白人、本土及黑人家庭看作不同的种族基石时的理想时，关于家庭的看来相当美好的愿望就出现成为再造种族及阶级秩序的基本机制。

种族及阶级分离居住而构成种族及阶级分离的邻里关系的核心认同的历史形成了美国种族秩序的重要支柱。就像真实家庭的价值反映了种族和社会阶级秩序中的位置一样，描述这些家庭所居住的街区的财产价值展现了相当的不平等。鼓励家庭购买单一家庭住宅及其它居住选项的实践掩盖了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住所财产价值是如何成为种族秩序核心的。比如，住房供给及阶级隔离的居住区，有人称为“隔离美国人”（Massy and Denton,1993），事实上保证了像米尔菊这样的家庭不可能作思夫人那样的家庭的邻居。种族、民族及阶级隔离的空间前提要求美国家庭及其居住的地方保持隔离。

正如从不同人种、种族、宗教或阶级背景的个体中建造一个家庭会遭到阻碍一样，不同种族混杂在一个居住区是也要受挫的。当种族和/或阶级同质性很强时，邻里关系据称是运行得最好的。阶级、种族隔离的居住区说明家庭和种族群体都需要他们各自独特的地方，这个地方能使他们找到“家”的感觉。把白种人、非洲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和新种族移民群体安置在各自独立的空间反映出维持地理、种族纯洁性的做法。作为主导群体，白种美国人仍在支持隔离非洲美国人、本土美国人、墨西哥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和其它类似群体因而延续着学校、居住区、公共场所种族化纯洁的文化准则的法律及法律之外的措施。在这方面，持续离开城市核心的白种人一直为许多公共政策所扶持，如给住宅所有者的税收优惠，资助高速发展的郊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在郊区限制低收入的住所，拒绝对想移到白人区的种族群体的贷款和保险，限制偏远的郊区工人阶级的种族孩子加入中产阶级白人孩子学校所在的城市地区。这些公共政策由看起来更个人化的、私人化的选择来执行，这些选择有效维持了白种男人、妇女和孩子种族隔离的生活空间。比如，美国公立学校、健康医疗、娱乐场所及保障军队的日益私有化说明了白种人用钱为自己及后代购买种族同质经历的能力。对这些实践值得关注的还有它们一般地作为非种族群体而得到保护，因为它们常常是以保卫家庭为名义。

美国家庭理想的性别化本质意味着种族隔离的地理和社会空间的种族秩序的生产也是高度性别化的。因为各种类型的种族化的生活空间被制定为私人空间，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的避难场所。由于周围都是具有类似目标的个体，这些家庭代表着理想化的、私人化的空间，在这里，家庭成员可以轻松自在。在维持这种作为保护地及复原场所家的感觉时，妇女是很重要的。家庭包含的妇女为再生产代表未来的孩子而负责。这两者都需要防止外来入侵者的保护。在种族力量的两个方面，白种的、本土的和黑人妇女因而占据着一个牢固的位置——她们必须从属于家庭以免受到家庭之外的威胁。再有，在一个家庭的理论和实践成为种族秩序奠基石的体系中，成为真实家庭或种族“家庭”符号的妇女就变得重要，这些家庭被构建为私人的，女性有权需要防止外来侵入的保护，保卫家庭就变得重要。

从这个意义来说，构建种族秩序是与社会阶级、年龄、异性化作为对比秩序而一起发生作用的性别化过程。性别被证明是一个可变的类别，这个类别并不总是与个体的生物学性别相吻合。传统家庭理想的性别化结构是与多种秩序共同发生作用的。但是关于家庭的这些思想是如何可以与种族化的美国民族认同并存的呢？

构建和重建美国民族认同

如果美国被观念化为一个美国民族大家庭而用美国家庭理想的理论来理解，那么这个理想可以提供评价群体位置及其对美国国家财富贡献的模板。在这种逻辑之下，本土美国人、非洲美国人、波多黎各人成为“家内他者”——他们包容进实体政治，像美国家庭中的一员一样。相比之



下，从墨西哥、中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来的种族移民变成了“外国黑人”和“拉丁移民”，他们成为排外性政策的目标。一个奇怪的逆转发生了、本土出生、国内黑人及本土美国人变成了准妇女。正如妇女为理想化家庭所必须而又从属之，本土出生的种族群体被建构为家里人。他们当然属于美国政治实体，但仍然处于从属位置。作为从国家边界威胁其安全的最近威胁，这些群体遭遇了剥削和围堵政策。相比之下，非洲和/或西班牙血统的和/本土背景但出生于美国之外的人被构建为外人。他们威胁的本质在于他们想进入，从而污染为美国民族家庭所保留的住所空间。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詹姆斯·彼得温（James Baldwin）美国化过程分析的回应突出了成为“类”家庭如何促进了差别待遇的性别化维度。在对种族和性别作了类比之后。她指出：

退回到对待别人好于对待自己：许多男人可以容忍别的妇女的一些东西却不能容忍妻子这些东西。因为妻子是他们的，必须做丈夫想要做的事（Baldwin and Mead, 1971: 70）。

在米德的家庭财产模型中，国内黑人和本土人民平等对待家庭中的妻子和/或孩子。因而，“孩子似的妻子”和“天真的妇女和孩子”成为构建种族和性别的模板。把种族群体描绘为智力发育不全、未受教育的孩子的种族意识形态要求把白人作为智力成熟、有教养的成人的相关思想。当应用到人种上时，认为成人比孩子更发展，因而应该具有更大权力的家庭理论利用天然化的年龄和权威思想使种族秩序合法化并分配权利、资格及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本土美国人、欧洲美国人、波多黎各人，拉丁美洲人是美国家庭中天生而从属的成员，由那些所谓的“家内”和内部少数民族所制造的潜在威胁可被看作比那些“家外”种族移民群体所呈现的危险还要大。

美国民族认同植根于这种把美国观念化作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性别化家庭理论中。还有，这种想象的民族的家庭通过利用自己市民的民族主义原则寻找团结中的秩序，这种民族主义宣扬超越阶级、种族、人种和性别群体组织在一起的特殊利益的整体利益。同时，种族民族主义思想把美国人口包容进在国家中秩序化安排的种族“家庭”中，在美国民族实体天然化秩序的背景下，一些种族家庭得到了美国成员的全部利益而另外一些则遭遇二等公民的劣等待遇。有趣的是，现在的白种人构建允许包容种族的变异。为了避免排除异民族以“变成白种”的同化过程，许多白种人现在宣扬多种族了。玛丽·沃特（1996）把这个过程称为“选择性异民族”并描述了异民族如何只成为白种美国人的“选项”。然而这个选择性异民族掩盖了白种人定义公民权的权力。只有白人为了代表一般化的民族成员可以避开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身份。只有白人才能成为完全的、活跃美国人。

代表种族化纯洁的典型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关，白种人构成了最有价值的市民。相比之下，种族群体仍然与代表特殊主义、落后、童真和特殊利益的污点相关。在这个种族化的国家里，种族群体总是协调于变动的种族意义，这种意义紧紧的与美国人对种族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国外出生和国内出生都与种族、性别、阶级和民族相关，这些都从彼此获得意义。本地人、亚洲美国人、奇卡诺人、本土夏威夷人、波多黎各人和其它“国内”少数民族变成二等公民。相比而言，从加勒比海、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来的很难被作为白人通过的移民在取得公民权时比欧洲国家的移民要困难得多。因为种族群体不能成为生理上的白种人，因而缺乏合适的血缘，这些群体面临着似乎与民族主义相抵触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三角提出的矛盾。再者，一旦取得公民权被吸收容纳进美国家庭，他们就面临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挑战，不像以前的可以成为白人的欧洲移民潮流，近来的种族移民群体最多只能变成“名誉白人”。

当处于种族化的民族主义背景之下时，通过家庭理论和实践形成的天然化秩序塑造了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对家庭的共通理解表明个体感到他们“欠”着成员什么东西或者要对家庭成员负责。比如，个体通过照顾孩子，借钱，安置工作和住房，或者照顾病人而时常帮助家庭成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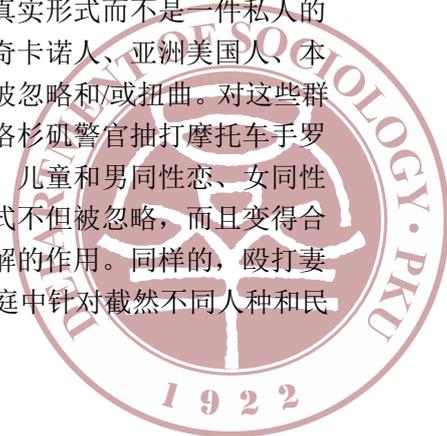
血缘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主要通过财产取得利益。在取得这些资格的问题之上，个体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这种责任依赖于其在家庭秩序中的位置。比如，妇女被期待承担着生产劳动力的角色，而男人的责任在于提供财政支持。

同样的，在民族主义原则下，出生或天然化的美国人取得了由成员而增加的某些权利和责任。所有美国人都被允诺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取得失业保险，老年的养老金，免费公共教育和其它社会福利。公民被期待完成对别人的义务，比如缴税、遵守法律、需要时服兵役。相对家里人的权利和责任而言，家外人，既没有群体成员提供的权益，也没有从属该群体而负的责任；类似于非家庭成员，非美国公民既没有公民权益也不用负家庭责任。

在种族通过既定血缘纽带构建的美国，市民权利和责任的不同分配产生了一等、二等公民的区分。这仍过多地受到基本种族三角的影响。公民权利在出生时即认定，不管个人优劣。为了确认这种差异，所有人需要做的是比较建立在他们出生时家庭的人种、种族和阶级基础上的美国孩子不同的公民权的分配。公共教育广泛变动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发人深醒的家庭出身问题多重要的个案研究。比如，比较一般提供给城市内部学校大部分非洲美国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和工人阶级的孩子和郊区中产阶级和大部分白人的学校的质量，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尽管 1954 年的布朗教育法案决定不允许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多数工人阶级和贫穷非洲美国人的孩子仍然在资助少、条件恶劣、种族隔离的城市学校中接受教育。不论个人的好坏，作为一个班的这些孩子被看作缺乏有点，不值得公共资助和被认定为二等公民。如果比较他们的命运和提供给全是白人的郊区学校，尤其是富裕地区的，常常是豪华的学校设施和服务，就会知道拥有一等公民权有多么重要。即使许多个人郊区孩子缺乏品德，他们父母的家的财产价值，在被欣赏价值的同质街区里这些房子的位置，职业和管理工作中父母的支配地位以及从前辈遗传下来的积累的财富，自动的授予这些阶级的孩子以一级待遇。

通过依赖这个信念，即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被安排以他们多属于得位置，位置、空间和领地得形象与以人种、国家结构的家庭的性别观念联系在一起 (Jackson and Penrose, 1993)。在这种逻辑下，每个事物都有它的位置，维持各类事务的边界变得重要。保持分离家庭空间的逻辑要求严格的区分自己人和外面人的规则。正如联接种族同质性的美国家庭和种族隔离的财产价值一样，美国民族认同也把保护美国边界作为确保美国公民的公民权的策略。保卫一个民族的“祖国”或国家领土长期以来对民族主义者的野心很重要 (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2; Calhoun, 1993)。就像家庭和居住区被看作排除外面人干扰一样，维持国家边界的完整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因为从二战以来美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防止本国“领土”受军事侵略相比所谓的美国国外利益变得不太重要。在外国领土的美国公民和美国事务代表着美国领土的扩张，这个民族家庭中的公民必须不惜代价受到保护。

秩序的所有情况也是如此，军队、制裁和暴力的直接和间接利用用来维持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也许是需要。然而，为了确保一个种族化的美国民族认同，暴力是如此普遍以致实际上变成无形的。比如，女权主义者对家庭暴力的揭示被认真的作为一种暴力的真实形式而不是一件私人的家庭事件曾经遭到长期反对。同样的，对本土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奇卡诺人、亚洲美国人、本土夏威夷人和其它通过征服和奴隶方式进入美国的暴力程度仍然通常被忽略和/或扭曲。对这些群体的暴力仍然缺乏披露，除非以剧烈的方式逮捕，如像录像带中放的洛杉矶警官抽打摩托车手罗得内·金一样。尽管他们的严重性最近有所增加，但是对种族、妇女、儿童和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的仇恨性犯罪仍然难以发觉。通过这种沉默，这些暴力形式不但被忽略，而且变得合法化。家庭理论在家庭层面上自我定义的群体中也起了减弱对暴力理解的作用。同样的，殴打妻子，对儿童的身体及性虐待成为太多家庭的“家庭秘密”。美国民族家庭中针对截然不同人种和民



族的妇女、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孩子的暴力的本质也被忽略了。

在美国，1965年以来的时期以变迁和持续的冲突群体为特色。“褐色美国”这个词形象地用来描述美国人口中变动的多民族矛盾及多种特征。当结合考虑关于家庭的变革思想，这些趋势一起创造了重新理解基本种族三角及美国家庭理想在塑造美国民族主义认同时的意义时新的机会。这些的种族意义是否会在新种族术语题目中得以重组或是否美国能够创造一个多民族的可以实际上反映民族主义原则的民主制还有待观察。然而，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变化确实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考察的途径。

有人曾关注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人的新种族流动群体迅速增长的数目超出了西班牙语裔人、波多黎各人、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及其它历史上从属种族群体的数目的影响。新移民群体人口把美国看作经济机会超过对白种人排斥的领地。因为多数人是因为经济和/或政治迫害而离开故土的。所以美国还代表着机会空间。肤色跟权利的新关系在大量人口变动下需要重新协调。在这个“褐色美国”，人口在增强和挑战长期以来的种族意义中尤其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拉丁人口在美国具有长久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拉丁人口规模和群体的多元化现在都处于拉丁人的名目之下，给予那些生物学上的白人利益而歧视那些本土人或者黑人。另一方面，因为拉丁人口可以选择在某一类中复制种族三角，这种人群通过包容他们自己人群中的多种族特征而消解种族三角的力量。再有，拉丁和其它群体之间也没有固定的界限——有“白种拉丁”、“黑种拉丁”以及无数结合的变异——拉丁人群具有构筑美国民族认同新的中心的能力，这种认同深深与其它人群交织在一起。

对跨种族婚姻长期反对的放松，还有白人家庭中逐渐接受跨种族收养提出了关于未来基本种族三角的一系列问题。变化的法律气候创造了混合种族关系孩子的可能。历史地来看，由于大部分这些非白种的孩子出生于与种族妇女的婚姻中，多数混合种族的孩子被吸收进现在的种族家庭中。然而，现在这些孩子越来越多地由白人母亲出生。婚姻和儿童支持法允许这些孩子作为白人母亲和父亲的孩子而赋予他们财产权。这些双种族的孩子不“适合”任何现在的种族类别或者他们也不应该属于。同样的，白人家庭收养及养大的种族孩子可不仅仅只适合任何一类种族类别。许多是“名誉白人”，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一个种族化的美国民族认同。总的来说，这两个群体都挑战了长期以来为美国家庭理想所发展的家庭纯洁和血缘线的理解。

美国人群中的越来越明显的肤色万花筒并不意味着基本种族三角的消失。相反，新的种族群体，加上美国公民、白人家庭中养大的种族孩子面临着20世纪早期欧洲和非洲加勒比海同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社会变动的人口统计，提供了另一个对抗美国公民认同的基本悖论的机会。总体来看，这些群体说明，区分白种、本土和黑人的界限根本不是固定和牢不可破的。相反，这种情形类似于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种族三角中不断协调种族位置图案的迅速变化，这些群体在与白人、本土及黑人的固定参照点中重新确定他们的身份。他们对美国认同的呼吁是否会采取种族三角的形式还有待观察。

结束语

美国民族认同中的悖论在多重矛盾中发挥作用，这些悖论包括，那些被允诺给与美国市民的公民权利的人同时遭到了不同的群体歧视；通过排除或吸收选定的公民类别，外部和内部种族主义一起或者相互作用；提供不稳定的、两面神似的美国民族认同中的种族民族主义；变动和持续的急促组合，使美国社会不断地转型却维持着根深蒂固的种族秩序；还有高度性别化的美国家庭理想，同时构建和隐藏了这些矛盾冲突。

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听取那些被“像”美国民族家庭成员一样对待意味着什么，以及排除美国



民族家庭之外又意味着什么的不同解释的人的话。在这个方面，米尔菊对“她们像可爱的小猫一样”看着的两个妇女的反应与她主人的截然不同。当听了思夫人宣称米尔菊像这个家庭的一员时，米尔菊谈到：

后来我再不能容忍了，我走进去，从桌上撤掉盘子，给他们看那可以放一个煎鸡蛋……当然，你可能已经听说，然后他们开始谈论别的其它东西。当客人们离开时，我进起居室说“思夫人……我有话跟你讲”（Childress,1986：2）

米尔菊提出的与思夫人“谈话”的要求为解释美国民族认同中的冲突提供了重要指导。首先，米尔菊拒绝她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她没有被赋予更好待遇的允诺所迷惑。因为，不像其他非洲裔美国妇女不被允许进入思夫人家里一样。她“像家庭中的一员”：

思夫人……你是一个为你工作的极好的人，但我希望你不要像对待一只小猎犬或……小猫……一样对我说话，现在你坐在那里听我说。

首先，你不爱我，你可能喜欢我。但那就是全部……第二，我根本就不像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家里人在客厅吃饭，我在厨房吃。你妈妈为她的公司借走你的花边桌布，你的儿子在你的客厅和朋友娱乐，你的女儿在她的起居室沙发打盹，玩具睡在你绸缎桌布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不像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在这段文字中，米尔菊清楚地描绘了在她的家庭中一等和二等公民的差别，并指出了成员的利益与她无缘。相反，从她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来看，米尔菊确认了普遍存在于现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多重种族群体的二等公民的两个维度。在这种美国家庭理想的逻辑中，非洲裔美国妇女从属于为强权的白人鞭子下的服役的动物或者载货的骡子、野兽，充当使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劳动力。这些仍是那些无法反对种族三角本身而目标在于与之共存的群体的情况。

米尔菊接着描述了，许多她接受的从属位置的思想都只是强势群体赋予她的思想，这些群体需要用传统美国理想的意识形态掩盖现存的权力秩序。比如，她明确的拒绝妈妈这个角色，一个把非洲裔美国妇女描述为对白人孩子具有无限爱和感情的角色。在向小卡罗阐述真情时，米尔菊明确的反对白人和非洲裔妇女的特殊家庭关系。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并不是喜爱你的小卡罗。我觉得她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她也是冒失而无礼的。我知道你称之为“外向”，这是你所希望的那种孩子。但是幸运的是，我母亲教我一些约束，不然有段时间，小卡罗对你说话象对狗一样，我会打她。但是我也是像你那样对此一笑置之，因为她是你的孩子，而我不像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从一个揭示看待种族、性别、阶级的独特视角的特殊社会地位来讲，米尔菊据斥了主导女权主义意识，即妇女应具有来源于母性的共同的女性意识（Collins，2000a：173-199）。米尔菊显然对思夫人关于孩子如何培养的思想不抱有好感，相反，米尔菊在关于像小卡罗这样的得到一级待遇的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孩和自己的留在家里受到二级待遇的工人阶级的非洲裔美国孩子之间划清了界限。这条划分美国种族、阶级、性别关系历史的界线在上面这段话中变得尤为明显——思夫人站在这边，而米尔菊站在另一边。

米尔菊也反对思夫人使用模糊阶级不平等的家庭语言的方式。思夫人认为米尔菊在为她家服务时是多么幸福，使得米尔菊因为发觉思夫人会想她而兴高采烈。米尔菊抛弃了这种被剥削者在他们的位置中很幸福的思想。

现在当你说：“我不知道没有她我会怎么办？”这是一个礼貌的谎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摔死或者中风。你会找另一个人来代替。

你认为当你说，“我们不认为她是个仆人……”是一种褒扬，但是当我汗流浹背的清洗浴室和厨房……整理床铺……做午饭……洗盘子……我没有感到是这个周末没有客人。我觉得我是一个



仆人，在你面前，我只想请求让我稍微有点提升，这会使我在这里的每个人感觉好些。使我感到我的工作是被认可的（Childress,1986: 2-3）。

在她们的谈话空间中，米尔菊挑战的不只是把她作为一个次要者的种族和性别思想，还有促成了她经济上从属位置的实践。米尔菊不仅反驳她像是一个家庭成员的想法，她只是请求这样说时对她的地位有所提升！无论思夫人怎么同情米尔菊的处境，找到更多的钱，给予米尔菊一个提升也许比一次有意义而虚弱的种族对话有用的多。

解决美国民族认同需要找到一种重新理解民族、种族和美国民族认同的关系的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重新构造家庭语言。在这个组织中，像米尔菊这样的妇女言论、行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揭示的是常常听不到的问题和视角。就像米尔菊提醒我们的，当谈及公民权允诺时，只是像一个家庭成员还是不够的。

注释：

1. 1956年以书的形式由一个小出版商第一次发表，这个艾丽思·查尔爵士的著作仍然被忽略了20年。认识到米尔菊的对白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在美国非洲裔女性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的分析，曲德·汉里斯(Trudier Harris)所作的文献评论使这个集子与1986年再版，书名为《像家庭中的一员》，也是这一集中第一篇文章的名字。尽管汉里斯作了努力，查尔思的著作还是被受到足够的重视。
2. 在阐述这些关系时，区分国家(nation),单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还有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几个词是很重要的。这些词常常互相通用，但是他们指的是不同的东西。“国家”包括认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并注定有共同将来的一群人。这个信念通常是由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所培植，如语言习俗；确定的地理疆界；共同历史和来源的信念；相信本国人民比外面人具有更紧密的联系；与周围群体的差异感以及对外来群体的相互敌视。一个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体系的特定内容构成了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是由这些群体为“民族”取得和维持政治力量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最后，当一个民族群体取得了足够的民族力量来实现其目标，它就控制了一个民族国家。(Calhoun 1993; Yuval-davis 1997)。
3. 关于如何称呼本土人民存在着差别各异的观点。诸如“美国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本土美国人”以及“本土人”等词都被各种群体所使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本土美国人”这个词，虽然我知道这远不是一个完美的词。

(黄霞译)

【译文选载】

国际迁移的跨国化发展：

对隐含的公民身份和文化现象的研究¹

托马斯·费斯特(Thomas Faist)

摘要：跨国社会空间、跨国社会领域以及跨国机制这些短语通常是指渐次高度制度化的跨多个民族国家的个人、网络以及组织之间的稳定持续的联系。但是在对由跨境迁移和难民流动而形成的跨国社会空间的研究领域内仍存在着两个严重的概念断层。第一，跨国空间和跨国团体经常被作为两个内涵相同的短语进行使用，就好像跨国空间仅有“跨国团体”这一种类型。本文分

¹ 本文原刊载于英文《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杂志2000年第23卷第2册，第189-222页。

